

伏正华 著

黔南人 学说

QIAN NAN REN XUE SHUO PU TONG HUA

普通话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南人学说普通话

伏正华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南人学说普通话/伏正华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7

ISBN 7-221-04341-8

I. 黔… II. 伏… III. 普通话-正音法-西南官话 IV.
II 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061 号

黔南人学说普通话

著 者:伏正华

责任编辑:黄 瑛

装帧设计:张世申

技术设计:梁 晴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制:贵阳市教育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11

字 数:235 千

印 数:7000 册

编写说明

编写本书的宗旨,正如书名所示,是想对黔南人学习普通话有所帮助。为此,我考虑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凡事只有认识到位才会有自觉的行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第一章说的是学习普通话是时代发展对于中小学生、教师、播音员、主持人、公务员、各行各业工作人员乃至全体人民的要求,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行为,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服务“四化”大业、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内容。

其次,要学习普通话,必须了解普通话的基本知识,掌握汉语拼音,发准普通话语音,这是学好普通话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还需要了解黔南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对应规律,编写第二、三、四章的用意就在于此。

第三,朗读和说话,是熟练掌握普通话语音,运用普通话表达和交流的最终目的。本书在第五、第六章介绍了朗读和说话的有关知识,并提供了部分练习材料。

为增强“推普”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目的性,本书内容编排特别注意以下几个结合:

一是与黔南方言实际相结合,归纳出各县方言与普通话的基本对应关系,找出规律,提供方法,以便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

二是与原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电部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和贵州省语委编写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的要求相结合。本书所讲普通话语音力求与“大纲”相统一，词条从“大纲”中选录（贵州不常用的不选，语素重复多次的选一部分），并用集中与分散交错安排的方式，一部分放在声母、韵母、声调、音变中分散学习，一部分集中附录于后。这两部分基本涵盖了普通话常用字词。用于练习普通话朗读的短文从“大纲”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选取。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小學生、中師生等普通话水平测试，也有利于教学。

三是与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的“基本功训练教材”相结合，一些内容有所加深和扩展，有利于基本功的强化训练和提高。

此外，本书还可做师范院校《现代汉语》课程和其他中专学校汉语课程的补充，便于教师结合本地方言实际，教好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同时，也可用作各种类型学习普通话培训班的教材。

需加说明的是，本书有关于学习普通话的具体指导，不仅有助于黔南人士，对于所有有志于学习普通话的人，都有切实的启发和帮助。

作者

1999年2月

学说普通话也是一种改革(代序)

推广规范的、全国通用的语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必须完成的社会历史任务。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尤其是当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推广普通话显得更为迫切。正如国务院在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所作的批示那样,“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项基本工程,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现在,推广普通话已经纳入法制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有类似的规定。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又把“大力推广普通话”列为主要内容之一。可见,推广普通话不仅是一种执法行为,而且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们应当增强国家意识、法制意识、现代意识,自觉努力学好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涉及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按中央要求,学校

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其他行业也不能落后。上述国务院批示说明,到本世纪末,“县级以上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武警指战员,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等,应当把普通话作为工作用语;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窗口’行业的职工要把普通话作为服务用语”。李岚清副总理还特别强调,公务员要和教师一样,“带头说普通话”。

黔南方言虽属北方方言体系,但与普通话仍有不小差异,所以黔南人走出黔南说方言,人家就听不懂;外地人初到黔南也听不懂当地方言。这就影响了黔南的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制约了黔南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是由于这项工作不像工农业生产那样,可以立竿见影,所以许多同志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觉得说不说普通话无所谓,只要周围的人听得懂就行了。有些同志意识到了,又觉得自己说方言已成习惯,说普通话很别扭,学起来有一定难度,因而在困难面前却步。须知,从说方言到说普通话也是一种改革,这就需要有改革精神。我们的同志应当从狭隘的地域观念中解放出来,要从提高人的素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度来审视“推普”的重大意义,自觉战胜困难,学好普通话。当然,如果能掌握普通话的基本知识,又懂得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困难就会减少很多。正是在这些方面,黔南州教育学院的伏正华同志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伏正华老师在黔南工作四十多年,对推广普通话颇有研究。数十年来,他一边教学,一边调查,总结出黔南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提出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具体学习方法,编写成辅助教材,收到很好效果。他曾作为贵州专家代

表,参加全国“推普”检查,并受聘担任贵州省“推普”检查专家组组长。退休以后,他说,要趁身体还好的时候,再为黔南人民做点好事,于是,撰写了《黔南人学说普通话》一书。该书不仅密切联系黔南方言实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学习普通话的捷径,还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着眼,根据党和政府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政策,多侧面地论述了推广普通话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本书对于我们学习普通话都很有助益,值得一读。

希望全州教师、机关干部以及各行各业工作人员都来读一读这本书,紧跟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在全州掀起一个学习、推广普通话的热潮,为黔南州扩大对外交流、优化发展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蒙秉武

1999年2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提高认识,明确要求, 努力学好普通话	(1)
第一节 汉语共同语的沿革和推广使用普通话 的重大意义	(1)
第二节 国家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和要求	(13)
第三节 澄清模糊认识,提高讲普通话 的自觉性	(16)
第二章 普通话语音	(22)
第一节 声母	(26)
第二节 韵母	(36)
第三节 声调	(55)
第四节 音节	(59)
第五节 音变	(69)
第三章 黔南方言语音辨正	(85)
第一节 声母辨正	(85)
第二节 韵母辨正	(109)
第三节 声调辨正	(145)

第四章 黔南方言和普通话常用

词汇及语法比较 (161)

第一节 常用词汇比较 (161)

第二节 语法比较 (180)

第五章 朗读 (185)

第六章 说话 (228)

第一节 说话的特点 (228)

第二节 说话训练的意义 (232)

第三节 说话训练的要求 (235)

第四节 说话能力的培养 (243)

第五节 说话的体裁和方式 (267)

附录一 《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水平测试大纲》

常用词语补选 (278)

附录二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318)

第一章 提高认识,明确要求, 努力学好普通话

第一节 汉语共同语的沿革和推广 使用普通话的重大意义

一、汉语共同语的沿革

语言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在人类早期,由于地域和生产力低下的限制,人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不大,这就形成了各民族的民族语和各地方的方言。当生产力提高以后,经济发展了,各地方集团之间,各民族之间相互兼并融合,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了,然而交流工具的不统一阻碍了人们的交往。这就需要一种彼此都会说能懂的共同语作为交际工具了。特别是到了现代,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共同语。

汉语共同语可远溯到春秋的“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指‘共同语’,同‘方言’对称。‘雅’有雅正的意思。”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三千弟子来自五湖四海,语音自然是五花八门的。为了让学生都能听懂,孔子教学用的就是雅言。这在《论语·述而》里有明确的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就是说,孔子读《诗经》、《尚书》,主持

典礼,使用的都是共同语,他算得上是一位用“普通话”的先师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适应经济、政治集中的需要,推行过“书同文、语同雅”的语言文字政策,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要求以国都咸阳话为标准来“雅正”人们的语言。汉代扬雄著《方言》,记录了当时方言纷呈的状况,同时也提出了“通语”这个概念,通语就是“雅言”的别称。元代实现大统一后,政府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中原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据文献记载,元朝官场已是“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中原音已成为元朝官场中处理政务,法院审案的工作语言了。因此,共同语又有了新的名称——官话。到了明朝,皇帝下令编纂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洪武正韵》,规定教师、学生说话、作文必须合乎《洪武正韵》,并在一些地区强令推行。清朝雍正皇帝在听取地方官奏报时,因听不懂方言,要人翻译,深感“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于是下了一道诏书,明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训导”,用行政命令推广官话。此后,全国各地都办起了“正音书院”。俞正燮《癸巳存稿》记载说:“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元、明、清官话的推广是有成绩的,不仅在官场和知识界的社会活动中有积极影响,也推动文学家们用北方话进行创作。譬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流传,除作品本身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外,还与“全书通体操京语”分不开。而《红楼梦》等优秀白话文学作品的流传,又推进了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共同语的发展。

但是,由于持续长久的封建统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约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一般民众体味不到方言隔阂的弊端,加上长期形成的方言习惯,官话就很难在民众中推广开来。

“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禁锢的大门。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有识之士才从固有的朝代、民族和地域观念中解放出来,开始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上去考虑共同语的问题,先后多次发起召开“读音统一会”,提出以北京语音为全国统一的“国音”的主张。“五四运动”期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当时的教育部也成立了相应的官方机构——“国语统一筹音会”。1926年,正式把共同语定名为“国语”,并在国内和海外华人区推广。直到现在,台湾省及海外一些华人社团仍然袭用“国语”这个名称。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空前统一和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的客观形势,中国科学院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把“国语”改为“普通话”(即普遍通用的语言),并经国务院同意,对语音、词汇、语法作出了明确界定,给现代汉语共同语即标准语下了科学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综上所述,汉语共同语从雅言——通语——官话——国语到普通话,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肤浅到深入,从单一(语音)到全面(语音、词汇、语法)这样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共同语的发展,乃是社会历史的必然。

二、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大意义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时期,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客观形势对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对使用共同语的要求日益迫切,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重大意义也更加突出。

从功能上看,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作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损失。“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但方言的分歧,制约、妨碍了这种交际作用的有效发挥。广东人讲“政治思想”,听起来就是“经济希响”。宁波人说话像唱曲,“24,35712”,经翻译才知道说的是“来发,棉纱线拿来”;“北仑区、北仑港”,听起来就是“不能去、不能讲”。“吃饭”这个短语再寻常不过了,可福建有的地方说 sáibàng;上海人说 qiáwé;湖南人说 qiàfé;贵州独山、平塘县的人说 qítá,而福泉、贵定、龙里、惠水等县一些地方说 cí māng,一些地方又说 cífé。独山人说“吃饭还没?”(吃饭没有?)即使听懂了方音的人也会纳闷:“怎么,吃饭还要‘还(huán)米’?”贵州边远地区布依族人说汉话,因为没有送气音,“兔子跑了”,就说成“肚子饱了”。有位贵定人到北京逛菜市场,操着带贵州腔的普通话问:“毛辣角多少钱一斤?”售货员满脸不解的神色,反问:“你说什么?”直到贵定人指着摊上的实物再问:“这个,这个多少钱一斤?”售货员才恍然大悟:“这叫西红柿……”由于语言隔阂,诸如此类的笑话、误解,简直举不胜举,有的甚至酿成严重后果。下面是几个历史和现实的实例: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原订于1907年2月19日4时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在广东潮州起义，因为浮山一路革命军领导人薛全福把4时误听为10时，耽误了时间，结果起义未成，反遭扑杀。

▲1989年3月15日《广州日报》有则消息说，山东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武汉两个好事青年问他们：“来武汉啥？”他们连忙说：“我们都是好人，别杀我们。”又一个武汉人过来问：“干啥？干啥？”他们又听成“该杀！该杀！”于是抡起棍棒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兄弟俩也因此成为罪犯。

▲1991年7月，江西宜春市第五小学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决定给学生打一种免疫针。有的家长误听为免育针，有的坏人乘机造谣：“打了这种针，三十年不会生育。”于是，家长们纷纷包围学校，抗议打“免育针”。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乡下，有的农民竟不让孩子到学校读书了。当地党政机关领导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以上事例说明，由语言隔阂带来的交流障碍，会引发令人不可小视的严重后果。如果大家都会说、能懂规范的普通话，上述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从政治上看，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既不是上层建筑，也不属经济基础，但它与经济、政治又密切联系。国家愈统一，经济愈发展，对统一语言的要求就愈迫切。恩格斯说过：“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①。”香港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人政治上、经济上长期与祖国隔绝，不是说粤方言就是说英语，对祖国的共同语——普通话非常生疏，许多青少年连自己是哪国人都不清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自从《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以后,香港人学习普通话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那天,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庄严地用普通话发表了他们的就职宣誓。回归后特区政府把普通话列为中小学的核心课程和公务员考核的内容。这决不只是个语言问题,更是政治上行使主权,实现祖国统一的体现。相反,国家分裂,也会导致语言分裂。苏联解体后,俄语就不再是前各加盟共和国的共同语了,独立后的各国都宣布以本民族语言为国语。1997年初,独联体成员国教育会议力求协调各国教育,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对俄罗斯提出的教学要“以俄语为主要语言的建议,除白俄罗斯同意以外,其他成员国均坚持学校用本民族语言授课^①”。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是受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的。但各民族又共同组成统一的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有着共同的祖国,当然应该有共同通用的语言。在当今,会不会说全民族的共同语,是体现一个人、一个民族文化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会讲标准语的人,不能参加竞选;教师不会讲标准语就没有任教资格;法官不会讲标准语,犯人有权拒绝回答提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学习、相互支援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各民族往来更加频繁,相互交叉、彼此融合已是司空见惯。这对于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繁荣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是

① 李莉《独联体成员国教育会议力求协调各国教育》,1997年3月17日《中国教育报》。

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这种交往就会寸步难行。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文规定:“少数民族干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在通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并大力推广普通话。”我们看到,学习使用普通话,已被全国各族人民高度重视。西藏自治区“孔繁森英雄事迹报告团”中有几位藏族同胞,他们的报告不仅内容感人至深,而且那口流利的普通话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经济上看,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扩大经济交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离开故土,南来北往,交往空前频繁。这时候,方言的障碍就显得特别突出,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严重损失。原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林炎志说:“普通话也是有经济效益的。仅举一例:目前经济官司中,大多数是因为语言无法沟通造成的^①。”

在经济发达但方言使用普遍的东南沿海一带,人们对此感受很深。有位台湾记者采访浙江宁波一位负责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发展经济靠什么?”那位负责人用方言回答:“一靠政策,二靠机遇。”这位记者听成“一靠警察,二靠妓女”,纳闷之余又追问:“妓女你们不抓吗?”答曰:“好的机遇(妓女)我们是抓住不放的。”旁边的人着急了,连忙翻译解释,

^① 郭萍《语言文字工作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炎志访谈录》,1995年11月27日《中国教育报》。